趋近化理论视域下的政治话语合法化分析

——以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为例[①]

武建国　牛振俊　华南理工大学

摘　要：政治话语在把政治愿望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鉴此，本文基于Cap（2006, 2008, 2014, 2017）的趋近化理论与van Dijk(2001, 2006a, 2006b)的社会认知模型，以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为例，分析了移民话语的语篇特征和其采取的合法化策略，即空间趋近化、时间趋近化和价值趋近化，以及合法化策略得以达成预期语用效果的背后原因。研究表明：移民话语表现为两极分化，即强调“我们”（美国人）好的事情和“他们”(外国人)坏的事情，并且运用趋近化策略将“他们”坏的事情向“我们”趋近，形成强烈的冲突；而“我们”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及其形成的社会认知对移民话语的主观阐释是使得移民政策合法化的深层原因。希望本文能为政治话语合法化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完善趋近化理论。

主题词：趋近化；社会认知模型；合法化；政治话语；移民政策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18)06-0048-06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8.06.007

1 引言

政治话语在政治的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政治话语研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教育、外交、经济、医保、环境和移民等重大问题；研究对象的形式也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包括演讲、辩论、访谈、政党宣言、社论、新闻发布会和新闻报道等。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作为研究政治话语的重要视角之一，已发展为当代语言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点中最具活力的科研领域（Wodak, 2012），其跨学科特征愈发明显，涉及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志和人类学等学科。其中，认知因素在CDA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众多由意识形态驱动意义识解的跨学科研究中均吸收运用了空间—时间认知和构想模型，为分析劝说性、操纵性和胁迫性话语、世界观以及构想提供了一种新视角（Cap, 2017）。

移民话语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与社会歧视、经济移民、恐怖主义密切相关，涉及每个国家的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此外，中东地区战乱不断，迫使大量难民涌入他国。与此同时，恐怖主义事件频繁发生，各国开始基于国情调整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移民话语自然成为CDA的热点话题之一。特朗普自参选以来，一直将移民议题作为争取选票的重中之重。他的许多言论引发了热议，如在美墨边境建一堵墙、禁止穆斯林入境和全面遣返非法移民等。

因此，本文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为语料（2017年1月20日至2017年12月30日，历时300余天，共计53篇演讲，53 509词），试图结合Cap（2006, 2008, 2014, 2017）的趋近化理论（Proximization Theory）与van Dijk（2001, 2006a, 2006b）的社会认知模型，从话语产出（发话者）和话语识解（听话者）两个维度出发，以探究特朗普移民话语的语篇特征、合法化策略以及达到合法化交际目的的深层原因。希望本文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政治话语及其背后的真实意图，以形成批判性阅读思维。

2 合法化

作为政治语言学中的基本概念，合法化常常是政治演说家追求的主要目的，且长期以来

作者简介：武建国，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话语分析、文体学、语用学，E-mail:fljgwu@scut.edu.cn。牛振俊，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话语分析，E-mail:zhenjunnew@163.com。

吸引着许多学者的关注。对合法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Weber（1947）的社会学分析，与权威、权力和意识形态等概念紧密关联。后来，Habermas（1976）指出话语中蕴含价值和准则，且不受语气限制，需满足开放性和自愿性的要求。因此，他认为合法化话语是一种交际形式，承载着公众舆论、政治理念和学术观点。基于Habermas的认识论框架以及其对“合理性”和“正确性”的阐释，合法化常常被解读为发话者权利的语言呈现（Cap, 2006; Chilton, 2004; van Dijk, 1998）。许多学者探究并总结出了合法化策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van Dijk（2006b）、van Leeuwen（2007）和Cap（2008）。

van Dijk认为合法化策略是社会—政治行为，其通过运用合理的理由及可接受的动机来为被批评的行为进行辩护（van Dijk, 1998）。后来，van Dijk（2006b）归纳出了书面和口语语篇的合法化策略，主要包括整体互动策略(词汇方面表现为积极的自我呈现和消极的他者呈现)；暗示自我“好的”宏观言语行为（句法方面表现为主动和被动语态）；语用宏观结构（话题选取）；修辞策略（夸张、委婉语、转喻和隐喻等）和表达方式。

van Leeuwen（2007）基于Wodak & van Leeuwen（1999）关于奥地利移民问题的研究，将合法化策略分为以下4种：权威合法化、道德评价合法化、理据合法化以及神话创作合法化。权威合法化常常通过人称照应（社会地位和角色）和非人称照应（规则和法律）、社会习俗（传统、一致性）以及专家或模范的推荐来实现。道德评价合法化常常提及价值系统（评价、抽象化和类比）。理据合法化往往提及制度化社会行为的目标、运用和效果（作用合理化）或事物运行的自然秩序（理论合理化）。神话创作合法化指通过叙述的方式（如道德故事和警世故事），将其结局创作为奖励合法的行为且惩罚不合法的行为。

Cap（2008）在阐释合法化定义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具有跨文化特征且出现于不同话语类型中的合法化策略，即断言、隐涵权术和共识。基于此，Cap（2013）以2003 年美国总统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为例，提出了趋近化理论，即通过空间趋近化、时间趋近化和价值趋近化使得发动伊拉克战争显得合法化（武建国等，2016）。趋近化理论从认知—语用角度出发，能有效地解释危机和威胁话语建构的合法化。但根据Hart（2011），理解与接收是交际中两个不同的过程。发话者的交际目的为被听话者理解且影响其行为；而听话者的交际目的为理解发话者所言并获取“自认为”真实有效的信息。然而，以上合法化策略（包括趋近化策略）均只考虑了发话者在话语产出维度运用的策略，并未从听话者角度阐释发话者的话语能被听话者接受并最终取得合法化交际目的的深层原因。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运用van Dijk（2001, 2006a, 2006b）对话语、认知和社会关系的识解，来完善Cap的趋近化理论，以解释其达到合法化这一目的的深层原因。

3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3.1 理论基础

3.1.1 Cap的趋近化理论

Cap在发掘空间认知与CDA关联的基础上，总结探讨了Chilton（2004，2005）话语空间理论（Discourse Space Theory, DST）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了从批评—认知-语用视角分析冲突话语与胁迫话语的新方法——趋近化理论。

作为语言学研究中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趋近化（proximization）是一种话语策略，由Cap于2006年首次提出。具体来讲，趋近化将时空相隔遥远的事件和事态（包括“遥远的”敌对意识形态）愈加消极地呈现给发话者和受话者（Cap, 2006）。发话者可能会试图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凸显遥远实体正逐渐侵蚀发话者—受话者领域（包括有形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但其主要目的通常为使自身提出的行为和政策合法化，以消除消极的、外来的、陌生的以及敌对的实体对自身日趋深远的影响（Cap, 2017）。

基于趋近化这一概念和其在不同话语领域的运用，趋近化理论将来自话语空间边缘实体的威胁称为指示中心外部实体（outside-deictic-center, ODC），其可穿越话语空间去侵袭指示中心内部实体（inside-deictic-center, IDC），即发话者和受话者。这里的威胁具有时间、空间和意识形态三种特性，集中体现于趋近化理论的“时空价值分析模型”（Spatial-Temporal-Axiological Analytic Model, STA）。空间趋近化指话语空间边缘实体向话语空间中心实体（即发话者和受话者）进行的实际侵袭；时间趋近化将过去以及将来的冲突事件向当前时间趋近，以营造出一种危难紧急的气氛，因此，人们需要立即回应并采取预防措施；价值趋近化将话语空间内部的中心实体与话语空间边缘的敌对实体的价值趋近，形成意识形态冲突（Cap, 2010）。值得注意的是，ODC与IDC之间的价值冲突很有可能具体化为实际冲突，对IDC造成破坏。

趋近化理论与STA分析模型均将话语空间的实体和价值与其对发话者和受话者的负面影响之间的符号距离缩短。因此，趋近化理论主要运用于分析政治话语，使得为预防外在威胁的干预性措施变得合法化。

3.1.2 van Dijk的社会认知模型

van Dijk（2001）指出，CDA只有通过多学科理论视角才有可能解释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许多学科（如语言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都试

图从认知与社会关系层面对话语实践进行阐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van Dijk（2001, 2006a, 2006b）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型。除了对社会的探究外，该视角突出强调认知因素在话语、交际和互动分析中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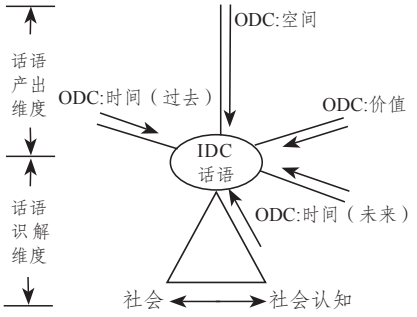
在社会认知模型中，话语指广义上的交际事件，包括会话互动、书面语篇以及相关的手势、面部表情、排版布局、图片和其他任何符号或多媒体含义。其次，认知包括个人和社会成员的认知、信仰、目标以及评价和情感，或其他任何话语和互动中涉及的心智记忆结构、表现或过程。最后，社会既包括面对面互动的局部和微观结构，又包括更宏观的社会政治结构，如集体、机构、组织、社会进程、政治系统以及较为抽象的社会和文化特征。

其中，认知作为话语和社会的交界面，为话语的理解提供了整体和局部的语境（Wu et al., 2016; 黄珊珊、武建国，2012）。在van Dijk（2008）看来，语境并非对情境社会属性的客观描述。语境取决于个人及其心智模型的主观认知理解，是语言使用者对交际情境的主观阐释。这一心智模型理论将社会情境的个人主观理解和社会—文化层面联系起来，弥补了以往语境研究的缺陷。因此，除了发话者需要善于运用相关话语策略外，某一特定交际目的是否能实现还与受话者的社会认知（知识、信仰、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等）及其所处的社会密切相关。

3.2 分析框架

为完善趋近化视域下的政治话语合法化分析，本文基于以上理论阐释，通过整合这两大理论，提出适合于本研究的分析模式（见图1）。

如图1所示，政治话语能否成功实现合法化语用效果，与发话者和受话者密切相关。具体来讲，为使某一政策合法化，首先，发话者常常需要有目的地运用趋近化话语策略来进行政治话语创作，即发话者将空间、时



（ODC：指示中心外部实体；IDC：指示中心内部实体）

图1 趋近化视域下的政治话语合法化分析模式

间（过去和未来）以及价值层面的外部威胁（ODC）向IDC趋近。此外，合法化交际目的的实现还需要受话者对政治话语进行主观理解，受其所处的社会及其形成的特定社会认知影响，即只有处于与发话者相同社会环境且具有相同社会认知的受话者才会认同发话者通过趋近化策略构建的威胁，才会使政治话语合法化。当话语产出和话语理解两个过程均顺利进行时，政治话语的合法化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因此，本文以特朗普移民话语为语料，从话语产出和话语理解两个维度对其展开合法化分析。本文通过运用AntConc软件对语料进行检索，以揭示其语篇特征。在话语产出维度，本文深入探讨特朗普移民话语如何利用趋近化策略使其移民政策合法化。在话语识解维度，本文对受话者，即美国公民所处的社会及形成的社会认知进行探究，以揭示移民政策得以合法化的深层原因。

4 语篇特征及趋近化策略

4.1 语篇特征

Cap（2008）在分析布什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演讲时，提出了6类分析合法化话语的词汇语法范畴，包括：（1）表示IDCs的名词性短语（NPs）；（2）表示ODCs的NPs；（3）表示从ODCs向IDCs移动的动词性短语（VPs）；（4）表示ODCs与IDCs接触的VPs；（5）表示ODCs与IDCs潜在接触的抽象NPs；（6）表示ODCs与IDCs真实接触的抽象NPs。通过运用AntConc对特朗普演讲语料的检索，本研究发现其语篇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移民话语语篇特征

范畴	关键词目/词汇索引	频次
1	[America/ US/USA]; [American nations /people /citizens / families /workers /industries /liberty /spirit /prosperity / greatness /dream]; [our / people/ children/ citizens/ country/ jobs/ economy/ military/ troops/ freedom/ values/ history]	1 584
2	[radical/ rogue/ murderous/ brutal /criminal regime]; [terrorist/ evil/ enemies/ dictatorship]; [foreign competitors/ goods/ terrorists]; [criminal aliens]; [illegal immigration]	227
3	[threaten/ attack/ confront]; [continue developing elements of nuclear/ destabilizing activities]	57
4	[defeat/ attack/ hurt/ destroy]	49
5	[conflict/ threats/ danger/ terror/ attack/ challenges/ job-killing]	53
6	[disaster/ poverty/ tragedy/ catastrophe]	45

如表1所示，范畴1和2中对IDCs和ODCs的指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IDCs多用中性或积极意义的词汇，而ODCs采用消极意义的词汇。范畴3和4则从不同层面将ODCs对IDCs的威胁趋近，产生了一定的压迫性。而范畴5和6则表现为实实在在的破坏和灾难。

4.2 趋近化策略

4.2.1 空间趋近化

特朗普上台后立马打出了“美

国优先”的口号，移民政策紧缩。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如何说服民众接受对6个穆斯林国家移民禁令等政策，是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核心所在。因此，在其就职演讲中，特朗普就针对这一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且试图运用空间趋近化策略为其移民政策进行辩护。具体请看下例：

（1）For many decades, we've enriched **foreign industry** at the expense of *American industry*; Subsidized the armies of **other countries** while allowing for the very sad depletion of *our military*; We' ve defended **other nation's borders** while refusing to defend *our own*; And spent trillions and trillions of dollars **overseas** while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has fallen into disrepair and decay. We've made **other countries** rich while the wealth,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of *our country* has disappeared over the horizon. One by one, the factories shuttered and left our shores, with not even a thought about th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American workers* that were left behind. The wealth of *our middle* class has been ripped from their homes and then redistributed **all across the world.** But that is the past. And now we are looking only to the future.

（2017/01/20 特朗普就职演讲）

本例选自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的就职演讲。演讲中，特朗普主要将ODCs（外国工业、其他国家、他国边境、海外以及全世界等，见粗体字），即美国以外的势力，对IDCs（美国工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边境、美国的基础设施、我们国家、美国工人以及美国中产阶级等，见斜体字）造成的威胁和损失进行空间趋近化。具体来讲，特朗普使距离美国公民较远的国外势力的影响趋近其自身，使美国公民认为他们的工业、军事防卫和基础设施等正面临着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他们自身造成的，而是由遥远的、其他的、外国势力引起的。此外，本例中将过去没有采取正确政策而造成的问题从时间上趋近，提醒美国公民，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以往的情况会继续存在。通过趋近化策略的运用，美国公民将外国公民视为“敌人”，自然赞成特朗普实行新的移民政策，即严格控制外来公民（即“敌人”）进入美国，防止他们剥夺美国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将实际的威胁和问题从空间上趋近美国公民，特朗普还运用了价值趋近化策略，称指示中心外部实体（ODCs）不仅仅“偷走”美国财富和削弱美国实力，更降低民族自信心（下画线部分）。这一点比实实在在造成的破坏更加严重，是美国人坚决不允许发生的事。因此，特朗普的演讲使得具有争议的移民政策显得合理。

4.2.2 时间趋近化

与共时的空间趋近化策略不同，时间趋近化策略往往带有时间标志词，将过去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事件向当前趋近，营造紧迫的氛围，具有历时性。例如：

（2）This week, I was joined at the White House by American families whose **loved ones were killed** by illegal immigrants. Many of these illegal immigrants **had extensive criminal records and had been repeatedly deporte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se deaths was preventable. **These beautiful American lives were stolen** because our government refused to do its job. If the government had simply enforced our immigration laws, these Americans would still be alive today. That is why, since the day I took the oath of office, I have been restoring the enforcement of our immigration laws and the protection and defense of our borders....The second bill, the No Sanctuary for Criminals Act, will block *federal grants to jurisdictions that shield dangerous criminal aliens from being turned over to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2017/06/30 特朗普每周电视演讲）

例（2）选自特朗普在2017年6月30日做的每周电视演讲。该例从历时角度将ODC对IDC过去造成的伤害进行时间上的趋近，为特朗普推行的富有争议的移民政策进行辩护。在电视演讲中，特朗普讲述了被非法移民夺去心爱的家人的事情，将过去发生的惨案从时间维度上拉近IDC，营造出一种威胁迫近的气氛。接着，特朗普进一步说明那些非法移民多数有大量犯罪记录并且多次被驱逐出境（见粗体字），因此，ODC过去对IDC造成的破坏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过去的政府拒绝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这里指特朗普推行的移民法），所以许多无辜的美国公民丧生，给家人带来无尽的悲伤。因此，我们（IDCs）需要恢复美国的移民法，以保护美国边境。由此可见，特朗普首先将ODC对IDC过去已经造成的伤害在时间上趋近，造成一种当下的危机感，从而引起共鸣。如此一来，他未来要实施的一系列移民政策和方针就显得非常合情合理，让受话者觉得那是美国政府理应采取的正确方案。此外，特朗普还把不采取措施、不颁布移民法将会造成的事实摆出：联邦政府通过行使司法权，使危险的、犯罪的外国人逃脱联邦法律的制裁，继续将未来的威胁或对IDC不利的事件在时间上进行趋近，从而达到预期目的。可以看出，时间趋近化策略可以有效激发听众的反抗欲，使发话者所推行的政策变得合理化。

4.2.3 价值趋近化

相比于空间趋近化和时间趋近化，价值趋近化策略几乎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有助于建立较为

抽象的话语，涉及较少的专门解释（Cap, 2015）。请看例（3）：

（3）My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your security, which is why we will continue to fight to take all necessary and legal action to keep terrorists, radical and dangerous extremists from ever entering our country. We will not allow our generous system of immigration to be turned against us as a tool for terrorism and truly bad people. We must take firm steps today to ensure that we are safe tomorrow. We will defend our country, protect our Constitution and deliver real prosperity for our people.

（2017/02/10 特朗普每周电视演讲）

本例选自特朗普总统2017年2月10日的每周电视演讲，其主要目的是为自己推行的移民政策进行辩护。演讲中，特朗普并没有提及外国公民对美国造成的有形的伤害，而是运用极具不同意识形态的抽象词汇对IDCs和ODCs进行描述。对于IDCs而言，ODCs（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者）是激进的、危险的、坏的，等等。而我们（IDCs）是合法的、慷慨的。他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价值观形成了强烈冲击，而价值观的不同很有可能形成实实在在的损害，即从价值层面将可能面临的威胁向IDC趋近。因此，我们理应去反抗价值观与我们对立的群体，保卫我们的国家，保护我们的宪法。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可能保证安全，才可能达到繁荣。由此可以看出，特朗普运用价值趋近化策略将国外“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趋近美国的价值观，形成明显的对立，且暗指可能会对美国造成有形的损害。由此，美国公民认为他们有权利且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灾难发生，而特朗普推行的移民政策恰好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即通过限制移民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5 社会及社会认知

语用效果是否能顺利达成，除了与发话者的语言策略有关，还与受话者的主观阐释有关，受其所处的社会及其所形成的特有社会认知影响，如信仰、知识、价值、态度和意识形态等（van Dijk, 2006a）。因此，受话者所处的社会及社会认知会操控某一话语的语境重构，进而影响话语的理解，其中最主要的是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

知识可分为个人知识、群体知识以及文化知识。本文中特指文化知识。文化知识由某一社会或文化的全部成员所共享，构成全部社会实践和话语的基础或共识（van Dijk, 2001: 114）。原则上所有公共话语中文化层面共享的知识很有可能是预设的。具体到本文，IDCs（美国公民）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其文化知识使IDCs预设外国人（ODCs）不如他们，ODCs 还“抢走”他们的工业、工作和梦想。除此之外，他们还预设伊斯兰国家不同于他们本身，是极不民主的，会对他们自身的文化造成威胁。正是基于这样特有的文化知识，才使得特朗普运用的趋近化策略发挥作用，达到使得移民政策合法化的交际目的。态度是社会共享的观点，如人们对移民、堕胎或核能等所持的立场，常常由一系列评价性命题组成。与知识相似，态度往往是特殊的、具体的。如美国对伊斯兰国的态度是基于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在911事件后，其对伊斯兰国的仇视态度达到了顶峰。因此，无论从空间、时间或是价值层面将伊斯兰国对IDC造成破坏和威胁的趋近都会使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合法化。最后，意识形态指社会群体的基本社会表现，是群体知识和态度的基础，如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等（van Dijk, 2001: 115）。社会群体运用其自身的图式结构来表示每个群体的自我形象、目标、活动和价值等。美国公民的意识形态受文明的文化谱系、宗教、哲学思想、地理人文环境、经济历史、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形成自由、平等的精神。此外，美国人注重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永远将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于是，当特朗普将遥远、过去或未来以及价值层面的对自身利益或价值造成危害的事情趋近IDC时，IDC的意识形态使其做出反抗，从而赞同特朗普推行的移民政策，并使其合法化。

6 结语

政治话语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着大家的切身利益。因此，本文以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为例，基于Cap（2006, 2008, 2014, 2017）的趋近化理论与van Dijk（2001, 2006a, 2006b）的社会认知模型，从话语产出及话语理解两个维度分析了移民话语达到合法化交际目的的原因。在话语产出维度，本文探究了特朗普移民话语的语篇特征及其运用的趋近化策略，即空间趋近化、时间趋近化和价值趋近化。在话语理解维度，文章从社会及社会认知角度阐释美国公民如何对特朗普移民话语进行主观理解，从而促使其达到合法化的交际目的。希望本文能够加深读者对趋近化理论及社会认知模型的理解，为政治话语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注释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大众语篇中的篇际互文性研究”(13CYY089)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语境重构策略研究”(X2WYC218007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Cap, P. *Legitimiz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 US War Rhetoric [M].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06.

[2] Cap, P. Towards the proximization model of the analysis of legitimiz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8 (40): 17-41.

[3] Cap, P. Axiological aspects of proximiza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0 (42): 392-407.

[4] Cap, P. *Proximization: The Pragmatics of Symbolic Distance Crossing*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3.

[5] Cap, P. Applying cognitive pragmatics to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A proximization analysis of three public space discourse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4 (70): 16-30.

[6] Cap, P. Follow-ups in the US antiterrorist discourse: Proposal for a macro-discursive approach to monologic follow-up sequence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5 (26): 543-561.

[7] Cap, P. Studying ideological worldview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space: Critical-cognitive advances in the analysis of conflict and coerc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7 (108): 17-27.

[8] Chilton, P.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9] Chilton, P. Discourse space theory: Geometry, brain and shifting viewpoints [J].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5 (3): 78-116.

[10] Habermas, J. *Legitimation Crisis* [M]. London: Heinemann, 1976.

[11] Hart, C. Legitimizing assertions and the logico-rhetorical module: Evidence and epistemic vigilance in media discourse on immigration [J]. *Discourse Studies*, 2011 (6): 751-814.

[12] van Dijk, T. A.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8.

[13] van Dijk, T. A.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A]. In Wodak, R. & Meyer, M.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1: 95-120.

[14] van Dijk, T. A.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6a (2): 115-140.

[15]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manipulation [J]. *Discourse & Society*, 2006b (2): 359- 383.

[16] van Dijk, T. A.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 van Leeuwen, T. Legitimation in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J].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2007 (1): 91-112.

[18] Weber, M.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47.

[19] Wodak, 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12.

[20] Wodak, R. & van Leeuwen, T. Legitimizing immigration control: A discourse-historical analysis [J]. *Discourse Studies*, 1999 (1): 83-118.

[21] Wu, J. G., Huang, S. S. & Zheng, R.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media discourse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6 (4): 441-466.

[22] 黄珊珊，武建国. 媒体话语中的重新语境化与改适转换——以“彭宇案”为例 [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4): 74-81.

[23] 武建国，林金容，栗艺.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新方法——趋近化理论 [J]. 外国语, 2016 (5)：75-82.

Analyzing Legitimiz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ximiz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rump's Immigration Policy

Abstract: Political discours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ransforming political wishes into social actions. In view of this, the present paper, based on Cap's (2006, 2008, 2014, 2017) proximization theory and van Dijk's (2001, 2006a, 2006b) social cognitive model, takes Trump's immigration policy as an example, and explores the textual features of immigration discourse and the involved legitimization strategies, namely, spacial proximization, temporal proximization, and axiological proximization,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successfully achieving expected pragmatic eff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 immigration discourse shows polarization by emphasizing "our" (Americans') good things and "their" (Foreigners') bad things, and proximizes "their" bad things to us through proximization strategies so as to construct conflicts. However, 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achieving legitimization is "our"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immigration discourse based on American society and its social cogni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can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legitimization analysi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so as to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thereby improve proximization theory.

Keywords: proximization; social cognitive model; legitimization; political discourse; immigration policy